

《荷塘月色》的時代感

周錫韓

香港大學中文系

雖說朱自清後期創作的「口語化」程度比前期更高，可是廣受傳誦、被公認為中國現代散文藝術珍品的，始終是前期的《背影》和《荷塘月色》。《背影》談者甚多，分析也中肯；但對《荷塘月色》中融凝著的憂悶、不安之感，能予以正確解讀者，則似乎未見。

一般讀者只欣賞其「景美情濃」的詩意，而細心的研究者已指出：「作者的『立意』，就表現為一種『中心心境』——『不寧靜』的、寂寞的、微憂的心情。文章自始至終，無不在襯託出這種心情。……一切材料、描寫，皆為襯託它而敷色、陳設。」（余樹森《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但此「中心心境」涵蘊如何，又因何而致呢？卻並不容易索解。就筆者手頭資料，綜合各家之見，可大致分為兩類：

一種意見認為，朱自清二十年代初大學畢業後，在江浙一帶的杭州、揚州、溫州、白馬湖等市鎮教書，「過了五六年轉徙無常的生活」，而父親丟官後，家境中落，面對「就將降臨的敗家的凶慘」，竟導致「互以血眼看著」的「骨肉間的仇視」；朱自清一家和父親、庶母的關係也嚴重失歡。這種情況於其北上任教清華大學（1925年9月）後雖有所改善，但仍不時產生困擾，故令他心緒「頗不寧靜」。這可稱為「家事」派。

另一種意見認為，此文寫於1927年7月，正是國民黨「清共」的「四·一二」政變不久，「嚴酷的現實使朱自清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鬱悶之中。他不滿於現實，卻又難以與之抗爭，覺得還是『暫時超然的好』（朱自清《那裏走》），渴望到大自然中尋找暫時的寧靜」（曾日紅《讀〈荷塘月色〉》）。這可稱為「國事」派。

雙方各執一辭，也似乎各有根據，但其實都不確切。

對「家事」說，有作者《背影》（1925年10月）一文的自述可作反證：「最近兩年的不見，他〔按，指父親〕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可見，那時父子關係已基本恢復正常。

至於後一種意見，則把二十年代的朱自清過分「政治化」了。其實，從鍾敬文的回憶便可見真象：「朱先生過去大概因為身體不好和家累頗重的緣故吧，對於政治、社會

的重大趨勢，雖然心中相當了然，並且有時也表現出極大的義憤（如「三·一八」慘案時，為文痛斥大屠夫段祺瑞），但是平常似乎不大過問時事（這在他，自然多少是一種苦惱吧？）自從聞一多先生被謀殺後，他的義憤就再壓抑不住了。¹可見，四十年代之前，朱自清並沒有太鮮明的政治態度。他本人的坦誠剖白也很可以證明這點：

在北京住了兩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過去。要說福氣，這也是福氣了。因為平平常常，正像「糊塗」一樣「難得」，特別是在「這年頭」。……於是木木然，心上甚麼也沒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著我的渺小，有些戰慄起來；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一封信》，1927年9月27日）

所以，如認為那時身居北平的他會純然為遠在南方的國共聯盟破裂而「陷入深深的困惑和鬱悶之中」，恐怕並不符合實際。

不過話說回來，當日朱自清「頗不寧靜」的心境並非與形勢、時局無關，而且還應該說關係相當密切。

1927年春、夏間，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進逼豫、魯，京華震動。張作霖兵敗，擬率軍退保山海關以避其鋒。於是謠傳四起，人心悚懼。這從清華研究院教授吳宓、陳寅恪等當時的動態可見一斑：

近頃人心頗惶惶，宓決擬於政局改變，黨軍得京師，清華解散之後，宓不再為教員，亦不從事他業。而但隱居京城，以作文售稿為活，中英文並行。（吳宓《雨僧日記》，4月3日）

是日為清明節，校中放假。上午，以不用之西書，裝成四箱，偕陳寅恪，以人力車運載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存放。蓋恐清華為黨人解散之時，匆促忙亂，檢取不及故也。（同上，4月10日）

陳寅恪於晚間來訪，談中國人之殘酷。感於李大釗等之絞死也。（同上，4月30日）

夕，陳寅恪來。談大局改變後一身之計劃。寅恪贊成宓之前議，力勸宓勿任學校教員。隱居讀書，以作文售稿自活。……又與寅恪相約不入〔國民〕黨。他日黨化教育瀰漫全國，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捨棄學校，另謀生活。艱難固窮，安之而已。（同上，6月20日）

1 鍾敬文：《悼朱佩弦先生》（1948年），載蔡清富、朱金順、孫可中（編）、《朱自清選集》第二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代序」，頁4。

到6月27、28日，清華更舉行「善後討論會」，公推教務長梅貽琦赴寧、滬觀察，與未來「執政」國民黨當局接洽。「並陳述意見。其目的在求得清華經濟及教育行政之獨立。其主張則：1. 以清華改辦各科研究院。2. 現有之大學部，應辦至已在校各班學生畢業時為止。3. 教職員任意更動，同人等決不自為計，云云」。² 可見朱自清任教之大學部實已作好解散之準備，而各教職員何去何從，還是未知之數。這些可能的變故對具正義感而又家累甚重的朱自清來說無疑是極大的隱憂。

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7月，清華留美預備部高等科三年級及二年級學生鑒於時局，要求提前結業，遣送赴美，從而釀成一場風潮。隨著事態擴大，不少教員都被捲入其中。³

與此同時，還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事：傑出學者、清華研究院教授王國維也因憂慮時勢鉅變，於6月12日投湖自盡，引起各方議論、揣測；6月16日，在北京「全浙會館」舉行弔祭（王為浙江海寧人），共收得哀輓詩聯數百副；在校長參與下，恤孤、悼念、營葬等活動直延至8月中旬始告一段落。⁴ 這場悲劇，也很可能給同事兼同鄉（朱原籍浙江紹興）的朱自清一個刺激，令他心頭蒙上陰影。

請看，1927年夏天竟發生了那麼多事情！這就是《荷塘月色》的寫作背景。文中著意表現的鬱悶、不安心境便是由此形成的。而各種因素之中，對作者衝擊最大、影響最深的，無疑是「黨軍」進城、大學行將解散、個人與家國均前途難卜這一點。⁵ 這也可算是朱先生此文曲折反映的時代色彩吧。

2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二章，頁48。

3 同上注，頁49-51。

4 參《國學月報·王靜安先生紀念專號》；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孫敦恆：《王國維年譜新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等。

5 朱自清在《一封信》中自白：「這幾天似乎有些異樣。像一葉扁舟在無邊的大海上，像一個獵人在無盡的森林裏。走路，說話，都要費很大的力氣；還不能如意。心裏是一團亂麻，也可說是一團火。似乎在掙扎著，要明白些甚麼，但似乎甚麼也沒有明白。『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正可借來作近日的我的注腳。」（9月27日記）便正是《荷塘月色》「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的同一心境的延續。《一封信》中又說：「南方這一年的變動，是人的意想所趕不上的。我起初還知道他（按，指作者的友人S君）的蹤跡，這半年是甚麼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樣地過著這狂風似的日子呢？我所沈吟的正在此。……恕我，恕我，我向哪裏去找你？」可見南方的局勢對他並非毫無影響，但遠不如北京近事來得切身而直接。